

被打个丢盔解甲，大败而归，一直被撵到清原县，仓惶退回山城镇。就在王营长率领队伍去辽中县的那时，我们司令部人员也随于芷山从台安县返回山城镇。路经沈阳时，于芷山带几个贴身随从到沈阳停下来（去哪、干什么我们都不知道），其余人乘车回到了山城镇保安司令部。于芷山从沈阳回来后不久，就奉调沈阳任第一军管区司令员。从此，他就成为日本的汉奸，完全暴露了他投靠日寇的本来面目。

从我的记忆中可以看出：于芷山去台安县是一次有目的、有计划的行动，绝不是探家访友。他暂时回避了山城镇日本领事馆同他的接触，并能在台安一带扩充自己的军事实力。可以说，他一面窥测沈阳方面日本人的行动，等待时机，一面积蓄力量，准备爬上比保安司令更高的官职。以后他被提任第一军管区司令和伪满州国军政大臣的要职，就完全说明了他贪婪的官迷梦的实现。

以上，是我对于芷山去台安县活动的回忆。

（摘自《海龙县文史资料选编》第三辑，现更名为《梅河口市文史资料》）

## 河本大作游说于芷山 及辽源被武装占领

杨启明

关东军司令部将河本找去，对他说：“事变之后，日本人还是要继续来满洲的（指日本政府原计划向中国东北移民50万人一事），现在需要一个真正能体会日满协同精神并能挺身而出的

人，来担当资源开发的重任，因此，有劳你去‘接收’西安煤矿。”并鼓励他要在这项工作中做出榜样。河本大作接受任务后，先后又与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特务部长驹井等人进行了详细研究。同时，关东军军部还令抚顺煤矿派出9人分别去原东北矿务局、沈阳中央法院、实业厅等单位搜集西安煤矿的有关文献资料，为“接收”做好准备。

1931年12月4日一早，河本大作与山本庆治2人，携带手枪，在3名便衣特务的保护下，由沈阳乘火车前来西安（今辽源，下同）。车过抚顺时，又有安田勇造、永井俊可、山本驹太郎、绪方八郎、原芝平三郎、中岛规矩夫、富崎义六、桥本熊纳、竹内善太郎等9人上车，与河本会合后的这11人为正式“接收”委员。其他随行人员还有吉田雄助、永相健尔、和田次卫、阿部伴治、柳泽实、平野零儿、海老新谷海、赵金山、林景竹等9人。当日下午，车过东丰时，曾有在事变前驻西安领事馆的一名警察，向河本大作叙说西安城内反日空气甚浓，建议暂时不要去西安，但河本“接收”心切，继续乘车西行，于傍晚到达西安。

5日上午，河本、安田、山本、芝原等4人，去西安县公署联系“接收”事项，声称他们是受奉天省政府的委派和关东军司令部的命令来这里“接收”西安煤矿井进行管理的。县长王桐（后挂印辞官）装病不出，出面接待的是代理县长崔子和、公安局长戴东藩二人。接待室周围布满了全副武装的公安队员，气氛比较紧张，崔、戴二人并不听河本一伙的申述，只强烈要求河本一伙退出。河本大作在退出之前故作镇静地说：“如果惹起不祥事件，就看做此地反满抗日的巢窟。军队可以立即派出飞机，不用一个小时，即可将西安县城炸平”。并要求午后4点再次在县公署会面。由于崔、戴二人经不住河本大作的恐吓，并得知河本一行来此的目的，并无夺取县政府权力之意，所以在

下午的会面中双方取得了谅解，缓和了气氛。6日上午，河本一伙便在县公安队员的保护下去矿区联系“接收”问题。那时，原西安煤矿总办王钧豪已携带细软出逃，矿长傅宝锐避而不出。河本等人在去矿途中遇到了曲××，他代表部分股东与河本进行了谈判。由于利益上的冲突，股东们拒绝交涉，使河本空手而回。7日，河本等人又与崔子和、戴东藩、县商务会长王擢、县财务局长曲海宇、县农会副干事长马荆山、沈海铁路护警头目、以及于芷山派来的翻译冯继光等进行协商，并请求他们从中斡旋。但由于在煤矿经营及任职等问题上，未能与股东们取得一致意见，所以“接收”工作未能取得任何进展。河本大作在此情况下，一方面准备返回沈阳，去辽宁省政府办理正式指令再来“接收”；另一方面，也做了凭借武力，进行“接收”的思想准备。

12月9日，河本大作带领几名人员乘火车返回沈阳，路过山城镇时，特地下车前往东边道保安司令部，准备在拜访于芷山的过程中进行游说，想得到于芷山对“接收”西安煤矿的支持。于芷山原为东边道镇守使，管辖东边道23个县，拥有四千多士兵，加上山高林密，地形险要，算是颇有实力的军阀之一。事变前，他与汉奸张海鹏、张景惠就有密切的联系，被视为“满洲独立派”。“九·一八”事变后，他先是采取观望态度。当时日本帝国主义以多门师团在北满全力进攻马占山部队，以铃木混成旅团牵制驻在锦州的张学良部队。他则以警备东边道为借口，保存实力，静观两军战况，保持所谓“独立”。所以事变以后不久，关东军曾派一个叫大矢的人到山城镇对其进行拉拢，开始没有取得什么进展，但到10月5日，于芷山看到形势恶化，便与岛本第二大队签订了契约，答应负责保护东边道境内“日侨的生命财产安全”，在日本侵略者的威胁利诱下投降了。当时，

河本大作还不知其中全部内情，但他从于芷山对日本浪人所采取的纵容态度和给日本商人贩卖鸦片的默许中，看出了于芷山的政治立场。因而在于芷山会见他时，对其极力加以诱惑吹捧，称赞于芷山不为张学良的“威吓”、“胁迫”所动，对日本方面采取了“友好、亲善”的态度，并趁机鼓吹“日中亲善”、“共存共荣”等滥调。在晚间的宴会上，他又对于芷山大讲所谓“满洲的光明前景”，并就当时的“局势”同于交换了意见。用河本事后的话说，这次会见是“初交如故知”，“极为融洽”。于芷山也向河本明确表示，他丝毫没有抗日的想法，愿意同日本帝国主义一道，镇压东边道一带抗日的爱国力量。同时，他还希望河本大作能从中协助，乞求关东军在军饷和军需方面给予援助。至此，于芷山的汉奸嘴脸已暴露无遗。河本大作为此行取得出乎意料的满意结果欣喜若狂。回到沈阳以后，即迅速将其在西安所经历的一切，向关东军干部部、政务部及驹井作了详细汇报，并转达了于芷山的请求，催促要抓住时机，加快与于芷山的联合。然后，河本大作又到奉天省公署求见臧式毅（臧为奉天省省长），详细叙述了他在西安煤矿遭到抵制未能“接收”的情况，并在沈阳很快办好了由省实业厅颁发的正式训令，12月16日，河本和实业厅第二科科长安集桐一起，重返西安。在河本去沈阳期间，留在西安的其他人员按照他的安排，分别到矿区的机械工场、东吉煤厂、第一露天掘和明治西安矿等地，了解其经营和组织情况，掌握煤矿的有关资料。

当时时令已进入深冬，日军所控制的铁路、工厂及军事设施用煤都十分紧缺。河本回到西安后，一方面与县政府及矿山有关人员交涉“接收”事宜，另一方面进行“接收”后矿山机构的安排。总办：河本大作；经理：安田勇造；采矿部：山本驹太郎、富崎仪六、绪方八郎、桥本熊纳、水井俊可、芝原平

三郎；营业部：山本庆治、中岛规矩夫，竹内善太郎。同时，并做好了以武力强行占领矿山的各项准备。

18日清晨，河本将其一行分为两伙，一伙是安田勇造、竹内善太郎等人，他们急速奔赴山城镇，请求于芷山迅速派出武装部队，协助河本大作对矿区实行武装占领；一伙以河本大作为领队，带着枪支和信鸽，于当日9点多钟向矿山进发，留下一人负责联系和看管行李物品。由于他们先得到消息，知道县农会下属的保卫团，已经派出以常秀山（后参加了红枪会）为队长的保卫团员埋伏在矿山周围的山腰上，以阻止他们的武装突袭。河本大作一伙行进的速度很慢，花了近两个小时，才到达煤矿事务所。在事务所门前，他们看到远山的山腰上，有保卫团在那里放哨，并将枪口对准他们。事务所门内空无一人，只见门扇上贴着“院内无人，强入有危险”的告示。河本判断，院内似乎有爆炸物，因而停在门外，不敢进院。就在这时，受于芷山电话的命令，负责当时西安县地方治安的骑兵连，在王连长的带领下，迅速赶到了矿山，与河本一伙会合，完成了对矿区的武装占领。

自19日至26日，河本等人在骑兵连的保护下，与原公司人员进行了交接。紧接着，汉奸于芷山将县公安局长戴东藩和县农会负责人傅××调至山城镇谈话（傅××未再回西安），迫其向河本妥协。27日，交接工作全部结束，晚间在月明楼举行宴会。从此，日本帝国主义与汉奸勾结在一起，对西安煤矿进行了疯狂的掠夺，广大矿工开始了最悲惨的生活。

（摘自《辽源文史资料》第二辑）